

# 亚洲走在前列：未来十年及以后的增长挑战

## 一、概览

过去五十年，亚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数亿人口摆脱了贫穷，一批批经济体迈入了中等收入乃至发达经济体的行列。虽然该地区曾经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的专业知识，但若干经济体如今已经处于技术进步的前沿。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间跨度不过两三代人而已，其成功源于下述因素的完美结合：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全球经济相融合、高水平的储蓄率、对人力和实物资本的大力投资以及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

虽然亚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大幅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但是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该地区显然处于全球经济的前列。该地区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60%以上，其2018年的预计增速为5.6%，2019年为5.4%。然而，有迹象显示，过去几年全球同步复苏的形势正趋于消退，亚洲和全球的经济预测所面临的风险目前转为下行，这主要是因为金融市场波动增加、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中国发展步伐放缓等因素。

除了这些短期和中期风险以外，亚洲的长期增长前景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挑战之一便是贸易。虽然难以预测事态未来将如何发展，但是政策制定者们眼下遇到了贸易有可能长期显著放缓的问题。如果关税螺旋式上升，各经济体越来越趋于封闭，那么全球增长将遭受重大打击，而亚洲则首当其冲——实际上，鉴于发达经济体中期前景变弱，本身就需要对其贸易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再平衡的亚洲经济将更显脆弱。

人口老龄化是另一项重大的长期挑战。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仍然

拥有年轻的人口，劳动力不断增加，而日本、韩国、泰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却早已失去了它们的人口红利。正如2017年4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所描述的那样，亚洲许多经济体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风险，即，当人口趋势转为不利于发展之时，这些经济体尚未能达到收入前沿水平。

和其他地区一样，生产率增长放缓也是亚洲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2017年4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记录了亚洲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情况，并确定了其主要原因，包括：研发投入不断削减、贸易开放度不断降低，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减少。但是企业层面的动态变化（不同生产率的公司之间资源配置不当）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亚洲引领着数字化的潮流，而数字化将会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甚至全球社会，不过，数字化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混乱和错位。例如，工人们害怕机器人取代自己，而金融监管者又担心最新的金融科技创新对金融稳定造成风险。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今后几十年中，如何驾驭好充满颠簸的向数字化未来的转型之路也将是一项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数字化很可能是长期生产率增长和福利改善的重要驱动力。

因此，虽然亚洲今日位居全球经济的前列，但是它面临着一些根本性挑战，可能需要该地区改变其经济增长模式。本报告及其四份背景文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亚洲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并确保其增长前景。接下来的一节简要描述了当前的局面，其后的各节分别分析了贸易、生产率和数字经济等内容，并提炼出背景文件的全面分析的重要观点。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 第一，加强宏观政策。正如综合背景文件（IMF2018a）所述，亚洲的宏观政策总体较为审慎，这一点需要保持。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增长前景依旧较好但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风险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经济体有能力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需更加侧重于建立缓冲，而汇率则应当保持灵活。在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或资本流动持续不稳定的部分经济体，应当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

- 第二，放开贸易和投资。关于贸易的背景文件（IMF2018b）从模型模拟得出的结论是，最近的关税行动和提案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在最初两年其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可能高达1.6%，整个地区的GDP可能会下降0.9%，不过，短期政策刺激有望抵消大部分影响，并且，该影响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放开贸易和投资体制（尤其是服务部门）以抵消外部需求的下降，从而促进全球和区域内贸易，由此形成新的地区增长驱动力。这一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而且改革的实施也将艰难而漫长，但是总的福利收益会非常可观。

- 第三，改善生产率增长前景。正如关于生产率增长的背景文件（IMF2018c）所述，企业活力下降加上金融约束不断增加（例如，过度杠杆）已经成为亚洲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政策制定者应当确保企业的准入和退出的自由度，防止无法存活的“僵尸”企业消耗掉本可优化分配至其他企业的资源，帮助企业处理它们的债务积压问题，并应采取措施促进创新和贸易开放。

- 最后，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同时应对数字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正如关于数字经济的背景文件（IMF2018d）所论述的那样，亚洲已经从数字化中获得了重大惠益。数字创新在亚洲过去二十年的人均经济增长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的贡献比重，电子商务似乎会带来较高的企业生

产率，数字化可能有助于完善税款征收工作和加强支出的针对性。与此同时，总的失业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严重。不过，必须强化旨在减轻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政策，以及旨在加强金融稳定的政策。此外，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种种措施可能会使数字化这一增长引擎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

总之，亚洲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挑战，但是只要继续主动而稳妥地进行决策，该地区很有希望在今后十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保持其全球前沿地位。

## 二、经济周期进入成熟阶段的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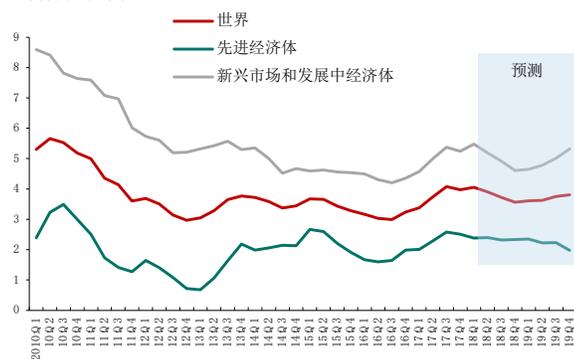
### 全球背景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经济扩张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而且各个经济体之间同步增长的态势不再显著。发达经济体2018年上半年的经济活动相比2017年同期有所放缓，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保持稳定（图1）。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与此同时，在低失业率和历史性的规模临时财政扩张的支撑下，美国国内需求继续旺盛。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亚洲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而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则较为疲弱。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WEO）强调的若干下行风险已经加大，或者部分成为了现实，例如，不断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基本面较差的新兴经济体出现的资本流出趋势。在这种好坏参半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下，已有迹象显示贸易增长正在放慢。

展望未来，2018年至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7%，比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期的水平低0.2个百分点。基线预测的假设是金融条件缓慢收紧、贸易增长相对健康（我们只把那些已经批准的关税制裁行动纳入预测分析）。发达经济体2018年经

济增长预计为2.4%，此后，随着产出缺口的弥合以及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下降，2019年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至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均为4.7%。除了对基线的修改以外，各种风险已经转为下行（尤其与金融条件收紧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相关，后文详述），由于石油价格上涨、金融条件收紧和种种特殊国内因素对各国的不同影响，各个国家预期也有所改变。

图1. 实际GDP增长  
(百分点；同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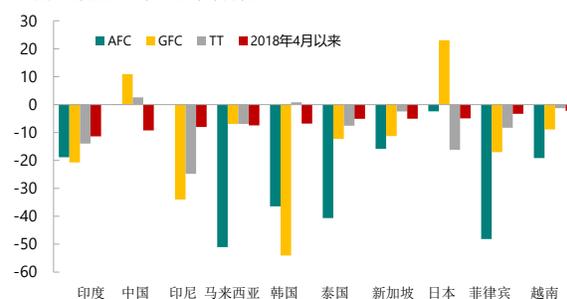
来源：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亚洲地区的近况

与2017年相比，201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趋缓，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依旧强劲，大致与预期相符。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17年上升至6.9%，并且将这一强劲势头保持到了2018年上半年，然而根据最新的高频指标（包括投资增长逐渐放慢）所显示，随后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日本在实现了两年的超出潜在水平的经济增长后，于2018年第一季度跌落至负增长区间，此后第二季度又强势反弹。印度的经济增长在废钞政策以及上一财年推行的货物和服务税引发的暂时干扰之后，继续稳步复苏。<sup>1</sup> 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除泰国外，经济增长在2018年上半年普遍趋向疲软。价格压力方面，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以及货币贬值，若干经

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2018年初，出口增长普遍放缓，但势头仍旧强劲，经常账户顺差则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而有所收窄。尽管如此，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大多数经济体（除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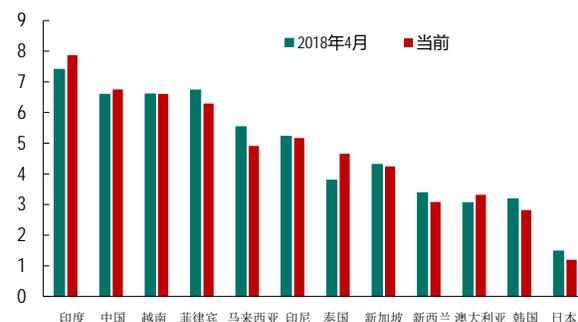
图2. 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变化  
(百分比变化；正值表示本币升值)



来源： Bloomberg L.P.；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 AFC = 亚洲金融危机； GFC = 全球金融危机； TT = 退出OEI时的市场波动

图3. 若干亚洲经济体：实际GDP增长  
(百分比；同比，2018年上半年)



来源：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金融条件有所收紧，尤其是在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主要反映的是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不断加剧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最近某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波动。2018年累计的证券投资流入远远低于2016年至2017年的水平，原因在于第二季度出现了大规模的外流——随着美元开始升值，投资债务证券的非居民的证券卖出开始增加。亚洲股价指数和汇率因贸易紧张局势而受到不利影响，

<sup>1</sup>更多国家详细情况可查阅基金组织（2018年a）。

债券收益率和利差普遍升高。亚洲地区一些中央银行提高了政策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和汇率压力，而另一些中央银行则以直接干预方式为本国货币提供了支持。最近亚洲资产的波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当年美国退出QE时的恐慌时期的情形，不过，

亚洲所受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地区，并且该地区的情况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得更紧密（图2）。

## 亚洲的近期前景

表1. 亚洲：实际GDP增长

（百分比：同比）

	估计和最新预测					与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的差异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b>亚洲</b>	5.6	5.4	5.7	5.6	5.4	0.0	0.0	-0.2
<b>先进经济体</b>	1.8	1.7	2.4	2.1	1.8	0.1	0.1	-0.1
澳大利亚	2.5	2.6	2.2	3.2	2.8	-0.1	0.2	-0.3
新西兰	4.2	4.1	3.0	3.1	3.0	0.0	0.2	0.1
日本	1.4	1.0	1.7	1.1	0.9	0.0	-0.1	0.0
中国香港特区	2.4	2.2	3.8	3.8	2.9	0.0	0.2	-0.3
韩国	2.8	2.9	3.1	2.8	2.6	0.0	-0.2	-0.3
中国台湾省	0.8	1.4	2.9	2.7	2.4	0.1	0.8	0.4
新加坡	2.2	2.4	3.6	2.9	2.5	0.0	0.0	-0.2
<b>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sup>1</sup></b>	6.8	6.5	6.5	6.5	6.3	0.0	0.0	-0.3
孟加拉国	6.8	7.2	7.4	7.3	7.1	0.3	0.3	0.1
文莱达鲁萨兰国	-0.4	-2.5	1.3	2.3	5.1	0.8	1.3	-2.9
柬埔寨	7.0	7.0	6.9	6.9	6.8	0.0	0.0	0.0
中国	6.9	6.7	6.9	6.6	6.2	0.0	0.0	-0.2
印度	8.2	7.1	6.7	7.3	7.4	0.0	-0.1	-0.4
印度尼西亚	4.9	5.0	5.1	5.1	5.1	0.0	-0.2	-0.4
老挝	7.3	7.0	6.9	6.8	7.0	0.1	0.0	0.0
马来西亚	5.1	4.2	5.9	4.7	4.6	0.0	-0.6	-0.4
缅甸	7.0	5.9	6.8	6.4	6.8	0.1	-0.5	-0.2
蒙古	2.4	1.2	5.1	6.2	6.3	0.0	1.2	0.0
尼泊尔	3.3	0.6	7.9	6.3	5.0	0.4	1.3	1.0
菲律宾	6.1	6.9	6.7	6.5	6.6	0.0	-0.2	-0.2
斯里兰卡	5.0	4.5	3.3	3.7	4.3	0.2	-0.3	-0.2
泰国	3.0	3.3	3.9	4.6	3.9	0.0	0.7	0.1
越南	6.7	6.2	6.8	6.6	6.5	0.0	0.0	0.0
<b>太平洋岛国以及其他小国</b>	4.5	3.0	2.6	1.4	4.1	-0.4	-2.3	0.2
不丹	6.2	7.3	7.4	5.8	4.8	1.4	-1.3	-2.8
斐济	3.8	0.7	3.0	3.2	3.4	-0.8	-0.3	0.0
基里巴斯	10.3	1.1	3.1	2.3	2.4	0.0	0.0	0.0
马尔代夫	2.2	4.5	4.8	4.7	5.0	0.0	-0.3	0.0
马绍尔群岛	2.0	3.6	2.5	2.3	2.2	0.6	0.5	0.5
密克罗尼西亚	3.9	2.9	2.0	1.4	0.9	0.0	0.0	0.0
瑙鲁	2.8	10.4	4.0	-2.4	-1.0	0.0	0.6	-1.0
帕劳	10.1	0.0	-3.7	0.8	2.2	-2.7	-0.2	-1.8
巴布亚新几内亚	5.3	1.6	2.5	-1.1	3.8	0.0	-4.0	1.2
萨摩亚	1.6	7.1	2.5	1.8	3.2	0.1	-0.7	0.4
所罗门群岛	2.5	3.5	3.5	3.4	2.9	0.3	0.4	0.0
东帝汶	4.0	5.3	-4.6	0.8	5.0	-4.1	-2.0	-0.7
汤加	3.5	4.2	2.5	2.9	5.5	-0.6	-0.3	2.6
图瓦卢	9.1	3.0	3.2	4.3	4.1	0.0	0.8	1.0
瓦努阿图	0.2	3.5	4.2	3.8	3.5	0.0	0.0	0.0
<b>东盟<sup>3</sup></b>	4.8	4.8	5.3	5.2	5.1	0.0	-0.1	-0.2
<b>东盟五国<sup>4</sup></b>	4.5	4.6	5.1	5.0	4.8	0.0	0.0	-0.3
<b>不含中国和印度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b>	5.1	5.1	5.5	5.5	5.4	0.0	0.0	-0.2

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计和预测。

1/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不包括太平洋岛国以及其他小国。

2/ 印度的数据是基于财年，财年起始时间为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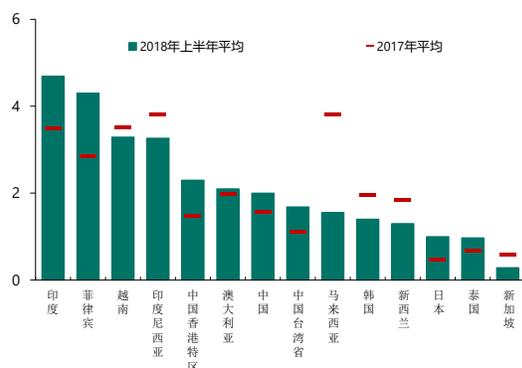
3/ 东盟包含：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4/ 东盟五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尽管出现了金融条件收紧和一系列下行风险（后文详述），但是亚洲的近期前景仍然乐观，这得益于稳定的全球发展势头和大体宽松的政策。亚洲国家依旧是全球主要的增长引擎，2018年经济增长预计为5.6%（与4月的预期相同），2019年经济增长预计为5.4%——比4月的预期低0.2个百分点（图3和表1）。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市场压力和由此导致的部分经济体政策收紧，但是最近的关税行动是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正如下文所述，这些行动本身理应导致增长更大幅度放缓，但是中国（或许还有其他经济体）实施的政策刺激很可能会抵消大部分的影响。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仍然是6.6%，但是2019年的预期则从6.4%下调至了6.2%，中期风险有所上升，这反映了去杠杆化步伐的可能放缓。日本201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2%下调至1.1%，反映了其季度产出起伏变化的模式，中期经济增长预计将趋近于潜在水平。印度2018/2019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3%，2019/2020财年的预期为7.4%，两者分别下调了0.1和0.4个百分点，原因在于石油价格上涨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东盟四国除了泰国以外经济增长预期均有所下调。<sup>2</sup>

亚洲整个地区2018年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上升至2.7%，2019年达到2.9%，这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然而，若干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持续低于目标（图4）。经常账户顺差预计将随着石油价格上涨而收窄。

图4. 亚洲若干经济体：总体通胀  
（百分比：同比）



来源：CEIC Data Company Ltd.;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预测所面临的风险

近期，风险平衡已经转向下行，并且，正如2018年4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所述，在中期内风险也持续偏于下行。虽然过去几年里预测机构（包括基金组织）系统性地低估了复苏的力度，但是如今，鉴于2018年上半年的产出情况，以及前瞻性指标释放出的逐步走弱的信号，这种复苏趋势似乎已经不再显著。近期下行风险的来源包括：

- 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继2018年初提高洗衣机、太阳能电池、钢铁和铝的关税之后，美国于6月15日宣布，其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一系列产品（价值500亿美元）征收25%的关税。中国宣布将采取类似规模的报复措施。9月17日，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一项关税，从2019年1月起征，税率初始为10%，最后将升至25%。中国也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另外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美国还表示有可能对其他价值2670亿美元的货物（几乎涵盖了剩余的从中国进口的所有货物）采取关税措施，并且，美国还另外拟定了汽车关税措施，这可能影响其他许多国家的汽车行业。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打击信心、损害金融市场、打乱供应链、抑制投资和贸易。下文讨论的模型模拟表明，在未来的两三年里，亚洲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下降

<sup>2</sup>IMF (2018a) 对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前景作出了详细描述。

0.9%。保护主义的加剧还可能导致贸易消费品价格过高，并加剧通货膨胀。

- 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美国通货膨胀率有高于预期的迹象，这可能导致美联储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以高于市场重定价能力的速度收紧货币政策。风险偏好的突然恶化、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以及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金融条件收紧。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出现的混乱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并可能导致资本流动减少和融资成本提高，从而对亚洲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基金组织的“灵活的全球模型系统”模拟表明，金融条件收紧可导致亚洲GDP的下降，降幅将高达0.75个百分点（IMF2018a）。

- 本地风险。中国的宏观政策侧重于消除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严重金融脆弱性，但是向稳增长方向的政策转变可能意味着在去杠杆化方面会放慢进度，因此中国乃至整个地区面临的中期风险将上升。各个经济体也面临着各自的本地风险，这些风险的来源包括：韩国等国私有部门高杠杆率、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特区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印度实施结构改革的进度滞后。

### 制定政策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各项政策和改革应努力维持当前的经济扩张态势，控制风险，并提高抵御不断增加的下行风险的能力。政策还应当促进中期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包容性。持续开展国际和地区协作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总体目标。由于所处经济周期位置、其结构性问题和可用政策空间的不同，不同经济体的具体政策优先事项也应各不相同：

- 正如IMF（2018a）所讨论的那样，总体上，应允许汇率灵活变化，并发挥减震器的作用，而外汇干预手段应仅用于应对无序的市场状况。

- 货币政策应能够独立应对通货膨胀和实现国内目标——目前亚洲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低、产出缺口为负，因此货币政策总体上应当保持宽松；不过，一旦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资本流动持续波动且资产负债表显示存在重大的货币错配，就应当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 金融稳定应当通过适当的微观和宏观审慎措施加以实现。

- 财政政策应当侧重于建立缓冲、支持长期包容性经济增长，以及减少过度的外部失衡。

- 最后，应当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产出和生产率、促进劳动力参与水平（包括女性的劳动力参与），以及确保社会各阶层均享有机会。正如下文各节所讨论的那样，关于贸易自由化的工作、增强企业活力的措施以及旨在利用数字化带来的惠益并同时消除其导致的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混乱的政策，都是特别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优先事项。

## 三、贸易在亚洲的作用不断发展演变：揭开新的篇章<sup>3</sup>

亚洲总体上对贸易的严重依赖，尤其是亚洲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是该地区实现骄人的经济增长成就的关键原因。但是，随着该地收入水平和工资的不断增长，加上发达经济体中期前景不太乐观，亚洲需要重新考虑其当前主要侧重于满足其他地区最终需求的增长模式（IMF2016；Mano 2016）。

除此以外，中国并没有像韩国和日本早些年那样快速退出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部门，这就可能限制亚洲下一批发展中经济体的机会，进一步凸显了建立新模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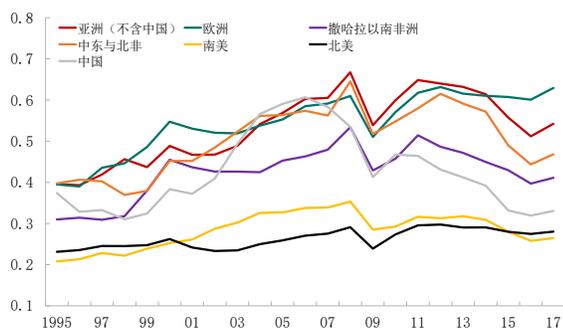
<sup>3</sup>本节依据基金组织（2018年b）编写。

必要性（Mathai等人 2016）。最后，制造业在就业方面的比重长期持续下降，加之自动化（例如，机器人）快速崛起，都说明了加强可贸易服务的必要性（IMF 2018e）。

在亚洲面临这种结构转型的同时，该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又遭遇了发达经济体日益内向化的政策的威胁。最近出台的关税和投资相关政策行动影响重大，会对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不过，相关政策刺激可能会抵消其中的部分影响。计划中的贸易冲突升级措施以及对信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将对整个地区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

另一方面，重新承诺建设一个以规则为基础、开放而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在全球层面继续深入开展贸易自由化谈判，将会提高生产率，增加收入（IMF, World Bank and the WTO 2017）。在亚洲，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协定的框架内降低货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亚洲开发银行 2017年），但贸易限制和所谓的“贸易成本”仍然很高（Cerdeiro和Nam 2018）。推进改革，尤其是农业等进度较慢领域的改革非常重要。此外，开放服务和数字贸易的新领域可以极大地促进区域内贸易和全球贸易，使亚洲成为全球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IMF, World Bank and the WTO 2018）。

图5. 贸易开放度  
(指数)



来源：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基金组织贸易流向数据库；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主要结论

本报告的第二份背景文件（IMF 2018b）审视了贸易作为亚洲增长的驱动因素的发展演变历程，并考察了贸易在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发挥这种作用。首先，该文件指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开放度（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头十年初开始急剧升高）总体不再提升，甚至有时还会下降，这体现了全球贸易的放缓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成熟，尤其是在中国（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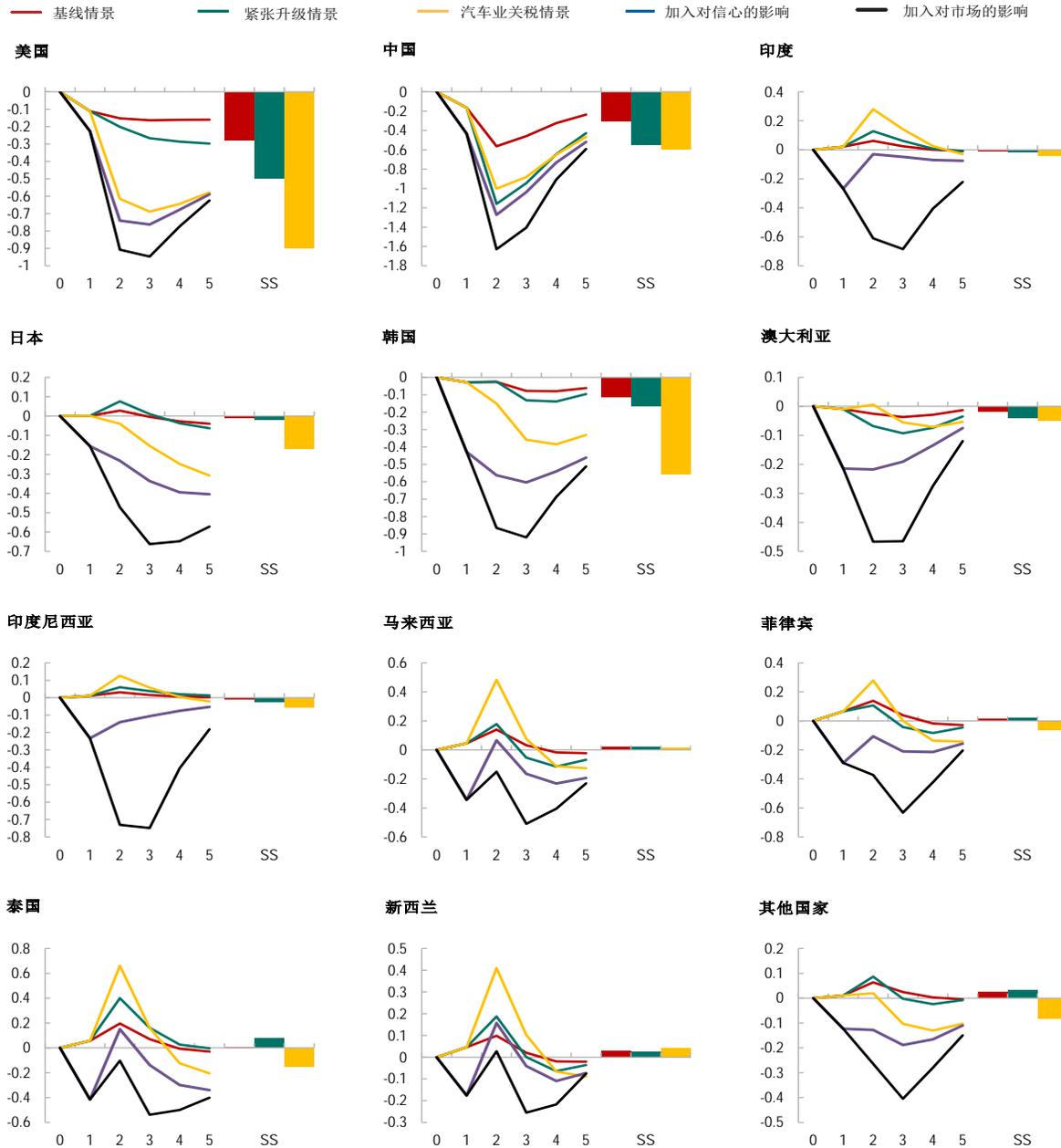
该文件随后使用了两个补充性的模型来检验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分析相一致。最近生效的关税和报复措施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具有实质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图6中的红线）。如果加征其他关税（绿线和黄线），那么GDP损失会大幅增加；如果商业信心和金融市场受到打击（蓝线和黑线），那么GDP损失更是会大幅增加。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关税对产出的影响会在若干年后消退，但是这种影响在中国、韩国和美国则巨大而持久（图6中的条柱）。如果所有这些途径都产生影响，那么已经生效的和拟议的关税和报复措施将给中国造成高达1.6%的GDP损失，同时给美国造成接近1%的GDP损失；亚洲其他经济体——大多通过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供货，并且/或深度参与汽车贸易——也会出现经济的大幅放缓，亚洲的整体GDP的损失最高可达0.9%（图7）。<sup>4</sup>短期失业总数可能不会很大，但是某些部门、尤其是特定关税所针对的部门则会遭受相当大的影响（图8和9）。

<sup>4</sup>上文表1中的预测尚未如此大幅下调，因为部分关税行动并未付诸实施，还因为假设中国会采取大量刺激以支撑经济增长。

**图6. 贸易紧张情景的实际GDP影响：按经济体细分**

(与贸易紧张情况之前的百分比偏差)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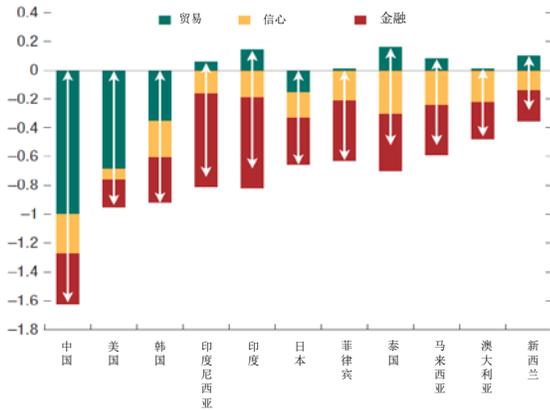
注：横轴的SS表示稳态的结果。基准情景指的是已经生效的美国对铝钢产品的制裁措施、美国对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措施（加征25%）、中国相应的反击措施，以及美国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进一步关税措施（初始加征10%，最终加征至25%），还有中国已经宣布的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措施，这些都计入《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线预测情景。紧张升级情景指的是美国进一步对来自中国的267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以及中国相应的提高来自美国商品的关税征收面和税率的反击措施（涉及约1300亿美元美国出口产品，从而使来自美国的所有商品都将加征25%的关税）。汽车关税情景分析的是美国关于对所有整车和配件产品加征25%关税的建议（价值3500亿美元产品）以及相应的反击措施。第四个情景将愈演愈烈的贸易紧张局势对信心以及企业投资计划的影响纳入分析。第五个情景考虑了金融条件收紧后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过去，亚洲经济体曾通过降低关税支持了经济增长，但是近几年，自由贸易方面工作的进度放慢了。亚洲仍然承担着非关税壁垒导致的高额贸易成本。对服务业和外国投资的限制依旧相对较严，IMF (2018b) 中的模型模拟表明，目前有空间实施新一轮的自由化，并且这种自由化能够逐步提高该地区的生产率。

IMF (2018b)展示了三种分析情景——第一，中国针对所有贸易伙伴取消货物关税并降低关于服务的非关税壁垒；第二，亚洲所有经济体以这种方式彼此开放；第三，整个亚洲面向全世界开放（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在所有这些情景下，亚洲的贸易、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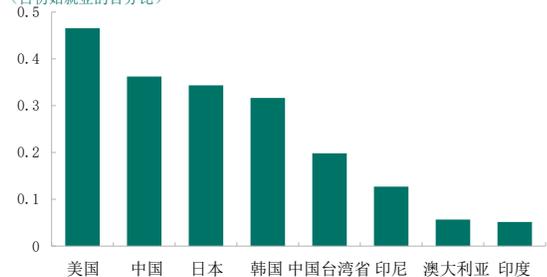
和产出均能实现增长，而且全球贸易和产出也能实现增长。在最后一种、也是设想最为大胆的情景下，亚洲经济体的GDP将平均增长近12%，部分经济体的产出增长将逼近20%（图10）。

**图7. 贸易紧张情景分析：对实际GDP的最大影响**  
(与贸易紧张局势之前的百分点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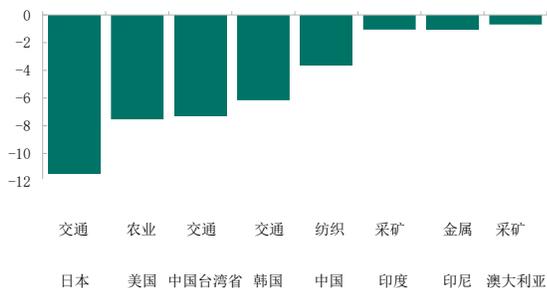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贸易影响包括基线情景、升级情景和汽车业关税措施；信心和金融市场影响作为单独部分列示。最大影响的时间大约为2020年。

**图8. 贸易紧张加剧情景下的总体劳动力再配置**  
(占初始就业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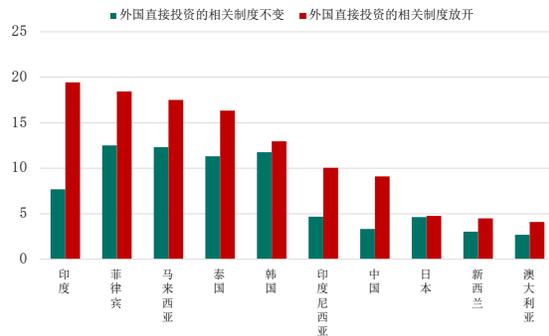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9. 贸易紧张情景下的主要就业损失部门**  
(占初始就业的百分比)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0. 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的效果**  
(相比基线情景的百分比差异)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因此，虽然今日的贸易紧张局势显然将对该地区乃至世界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尽其所能确保了贸易这一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地位仍然重要、并且事实上变得更加重要。多边自由化固然理想，然而亚洲范围内的诸边自由化也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次优选择。优先事项应当是降低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以及放开投资制度，从而促进区域内一体化及全球贸易。亚洲范围内的贸易流量应当越来越切合区域内的最终需求，以与再平衡议程保持一致，由此减少该地区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的依赖。随着投资限制的放宽，亚洲各经济体将更有能力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以及向价值链高端移动，在中间产品贸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知易行难。此类改革的研议促成基本上都需耗时多年方能完成，这主要是因为，自由化改革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亦见于IMF 2018d）。即便推行了改革，也还需更多时间才能真正享受到改革的全部惠益。此外，部分非关税壁垒可能来源于国内的扭曲问题，而这些扭曲问题恐怕不容易纠正。必须出台相关国内政策，以应对贸易相关调整，确保所有社会成员享受到自由化的惠益。基础设施投资、主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求职协助和培训计划）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能够帮助实现结构转型、提升工人技能和促进再就业。努力促进生产率增长，包括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一级的活力（正如下一节所述），显然也有助于缓和贸易改革产生的冲击。

## 四、亚洲的生产率增长： 提升企业活力，剔除僵尸企业<sup>5</sup>

2017年4月《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指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放缓，这种放缓在该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最为严重（图11）。此外，这种放缓并非暂时现象，而是持续的状况，甚至成为了部分经济体的“新常态”。IMF(2018c)，即本《地区经济展望》的第三份背景文件，对先前以国民账户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作出了补充，该文件研究的是Orbis数据集中亚洲的六个数据较充足的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2003年至2015年企业一级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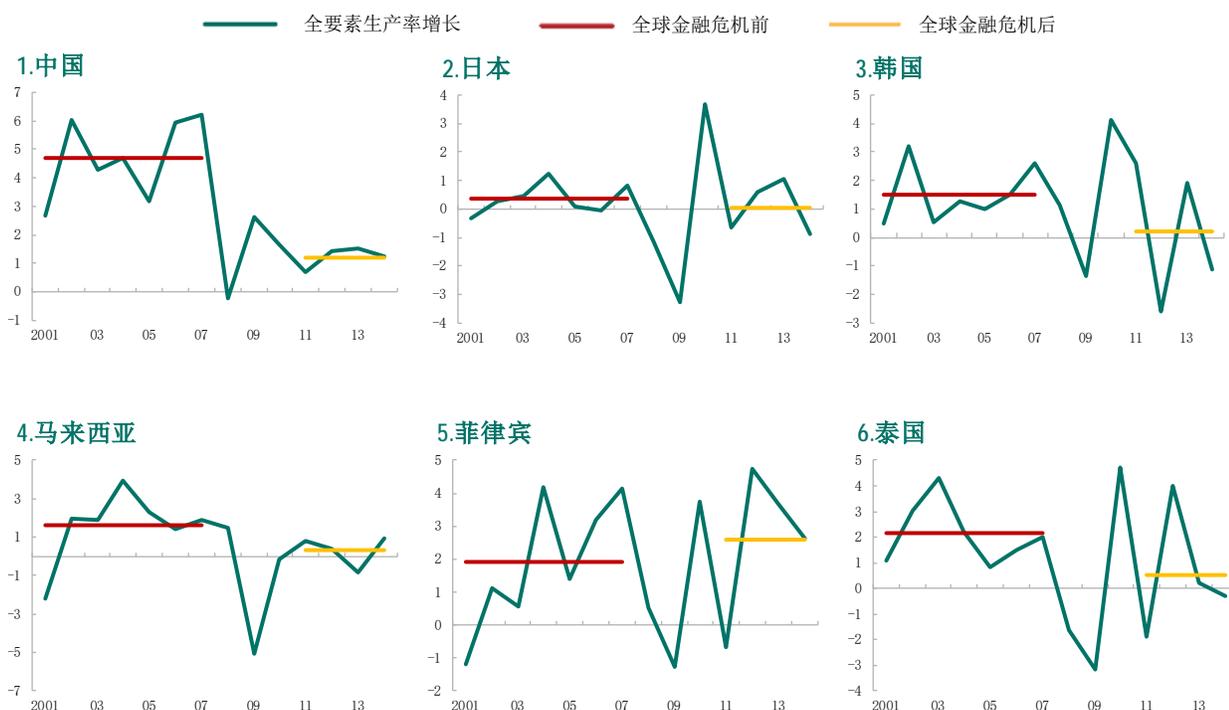
文献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活力（firm dynamism）——即企业诞生、

成长或衰退、以及退出的速度——可以通过持续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更有价值、更具生产力的活动来促进总体生产率的增长（Decker等人 2016年）。同样，从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之间资源配置不当已经成为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IMF(2018c)旨在探讨亚洲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以及，企业活力的丧失是否大幅推动了宏观层面生产率的降低。

在这一背景下，IMF(2018c)对三组问题开展了研究：

- 哪些企业特征与亚洲较高的企业生产率密切相关？企业活力及有关特征（例如，无形资本深化）具有何种重要性？
- 持续承受财务压力的企业（所谓的“僵尸”企业）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阻碍了亚洲实现更高生产率？
- 该地区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如何受到宏

图11. 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来源：Penn World Table 9.0

<sup>5</sup>本节依据基金组织（2018年c）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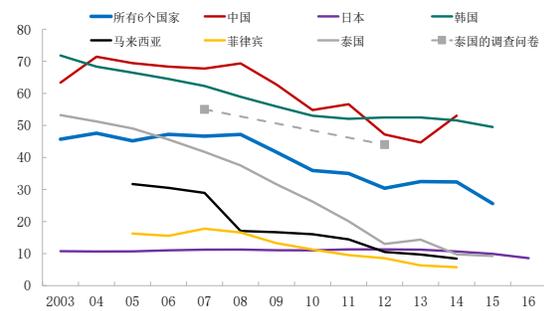
观经济变化（例如，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部门的转移）或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 主要结论

该背景文件首先表明亚洲的企业活力已经下降：年轻企业的比重下降（图12），而所谓“僵尸”企业（多为因杠杆率过高而面临财务困境的企业）<sup>6</sup>的比重上升（不过还没有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所呈现状况的程度）（图13）。<sup>7</sup>此外，年轻企业生产率增长水平往往较高（图14），而僵尸企业不但自身生产率增长慢，而且往往由于消耗了其他企业本可以更有效利用的金融、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而拉低其他企业的生产率（图15）。此外，IMF(2018c)还得出结论，企业一级较高的生产率增长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更多地投资于无形资产（例如，更多地进行研发），企业属于出口部门，或者是外资企业。总之，这些分析显示，企业一级的相关变化已经成为了亚洲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重要决定因素。

图12. 新企业的比重

（占所有企业的百分比；新企业定义为成立十年以内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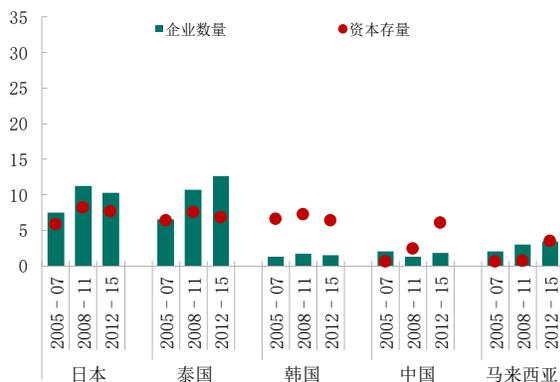


来源：除泰国问卷的数据以外的所有序列都来自Orbis，泰国问卷数据来自泰国工业调查；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IMF(2018c)还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和部门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经济计量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企业一级生产率急剧下降。其可能原因之一是，企业无法在需求紧缩的同时快速裁员和解散资本，因此它们的产出下降幅度大于投入下降幅度。如果这种解释就是全部事实，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对生产率的影响就应当是暂时的，因为各企业终将完成调整。然而，该背景文件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对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持久性，而且其影响是通过一种金融渠道发生的——杠杆更高的企业，其长期有形和无形投资出现了持续下滑，继而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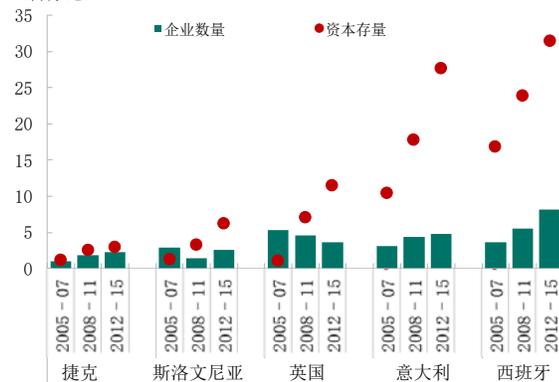
图13. 僵尸企业比重

亚洲僵尸企业数量及资本比重  
（百分比）



来源：Orbis；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欧洲僵尸企业数量及资本比重  
（百分比）



<sup>6</sup>我们沿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cGowan等人（2017年）的做法，把僵尸企业定义为成立10年或10年以上、利息覆盖率（ICR）连续三年低于1的企业。利息覆盖率的定义是，息税前收益（EBIT）与所支付利息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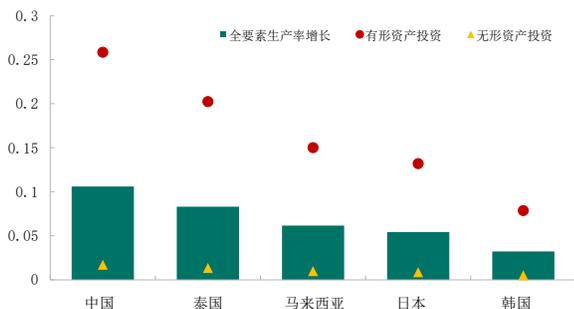
<sup>7</sup>由于某些特殊因素，包括企业补贴和其他支持的水平各异，对跨国比较结果的解释应当谨慎。

**图1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差异：新企业与老企业，2014年**  
(新老企业区分点为成立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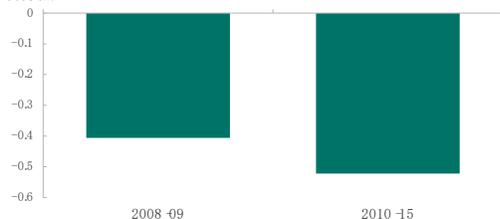
来源：Orbis；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5. 2005-2014年期间僵尸企业比重上升后对非僵尸企业造成的损失**  
(百分点)



来源：Orbis；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6. 危机前杠杆水平对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百分点)



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至于部门转移，IMF(2018c)（即本《亚太地区经济展望》的第三份背景文件）指出，这些对于解释一部分中国生产率增长放缓较有意义，但是在所研究的其他国家，该原因似乎并不是企业生产率的显著驱动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结构转型已经步入了更高级的阶段。

## 政策启示

上述结论表明，在大多数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并非宏观经济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不断下降的企业活力以及种种金融约束（尤其是过高的杠杆率）。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政

策来对其施加影响，该文件因此提出，政策制定者尤其应当重视三个领域：

- 培育企业活力。应制定各种支持性政策来营造一种更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以及，通过让无法存续企业退出市场，来促进资源的重新分配。应当降低行业进入和退出的门槛，包括：（1）完善破产制度以及取消关于让面临困境的企业继续经营的支助计划；（2）消除货物市场的竞争障碍；以及（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 消除债务积压和避免杠杆的过度积累。实现途径包括：（1）通过审慎的债务处置计划和企业重组计划来处理薄弱的资产负债表；（2）制定适当的制度框架，出台支持性的税收措施；以及（3）引入合适的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以控制杠杆率。旨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可以提高企业活力，从而刺激增长。针对公司股本的补贴制度可促进资本结构从债务向股权转移，降低杠杆率并促使企业进行有形和无形资本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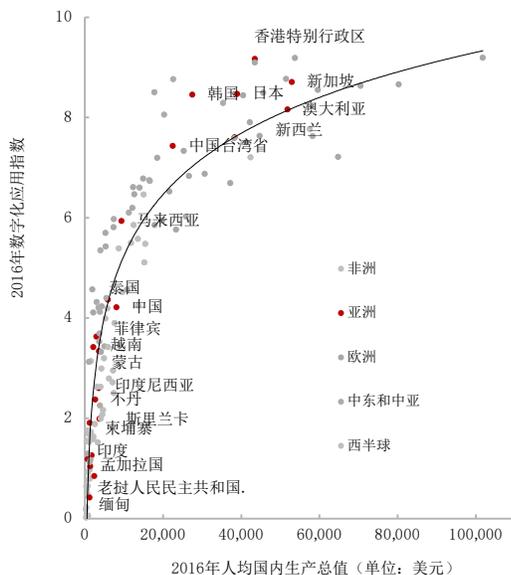
- 促进创新和贸易开放。亚洲部分国家已经采取了旨在促进研发的财政激励措施，这些措施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在不对竞争形成不当限制的基础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促进研究拨款竞争等方法，都有利于鼓励研发创新。此外，政策制定者应当继续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本国经济，因为竞争的激励作用和知识转移可以支持实现更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这方面，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大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亚洲在无形资本深化方面的发展趋势。

## 五、亚洲的数字革命：破坏因素还是新的增长引擎（抑或是两者兼具）？<sup>8</sup>

<sup>8</sup>本节依据IMF(2018d)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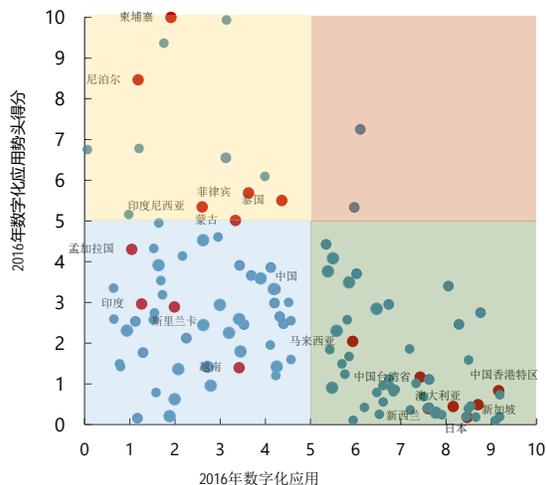
本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所探讨的最后一个亚洲经济前景挑战是如何在最大限度降低数字化革命成本的同时，收获数字化革命的潜在惠益。数字化和自动化虽非新鲜事物，但近年来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计算能力和密码学的进步以及大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所引发的新一轮创新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今天的技术进步与以往任何一个创新时期（如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相比，都更具多重性和重叠性，表现为协同增效作用和成果的加速实现。数字化革命关乎所有经济部门和一切经济活动，具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这些新技术具有通用性，拥有逐步改变全球经济、大幅提高生产率、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潜力，在这一点上很像蒸汽机和电力。然而，历史表明此种惠益的显现可能具有延迟性——在显现之前，新技术和配套的创新环节须先行得到充分积累，而且应用这些技术和创新的资本投资须完全到位。同样，可能发生的严重扰乱和错位影响也可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显露。因此，无论是与数字化有关的机遇，还是与之相关的挑战，很可能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图1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数字化应用**  
(指数0 - 10)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国际电信联盟，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18. 数字化应用：水平与势头**  
(指数0 - 10；2012 - 16年势头变化)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国际电信联盟；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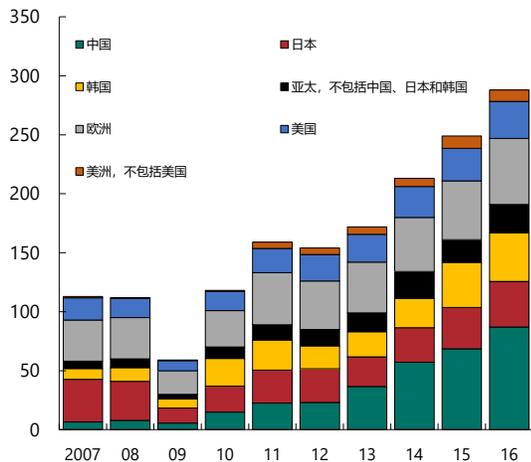
## 亚洲的数字格局

正如本报告第四份背景文件IMF(2018d)所述，亚洲一直走在数字化革命的前沿，但区域内部存在差异。一方面，在数字化各个领域的领军阵营中几乎都有亚洲国家；而另一方面，有些经济体严重落后。事实上，就数字技术的应用而言，亚洲区域经济体的分散度最高——考虑到亚洲经济体分属不同的收入层级，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尽管如此，亚洲经济体的数字化水平在任何收入组别中都领先于同组的其他地区的国家（图17），而且即便是相对贫穷的亚洲经济体，其数字化步伐也在不断加速——如图18所示，若干亚洲经济体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虽然现在偏低，但也在快速提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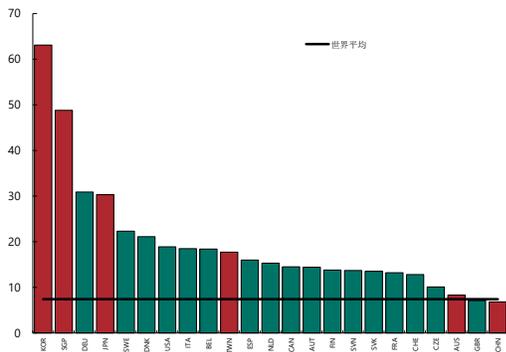
图19. 全世界各区域工业机器人目的地

(单位: 千)



资料来源: 国际机器人工程学会(2017年);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20. 2016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  
(每1000名雇员所对应的工业机器人存量)



资料来源: 国际机器人工程学会(2017年); 注: 图中数据标签系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家/地区代码。

再从数字经济的具体组成部分来看,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领域,亚洲一些经济体显然处于前沿。工业化机器人几乎全部用于制造业,而亚洲又是“世界工厂”,因此该地区的工业机器人使用量预计占全球总使用量的三分之二。自2010年以来,工业化机器人的使用量一直在加速增长:目前中国是最大的用户(约占市场总量的30%);2016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机器人使用量皆高于美国(图19)。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亚洲制造业体量庞大。在一些亚洲经济体中,机器人密度(每1000名工人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不仅高,而且还呈迅速上升之势(图20),这说明此类新技术在这些经济体内得到了快速而广泛的采用——事实上,韩国和新加坡在机器人密度方面位居全球前两位,德国

和日本紧随其后。最后,亚洲不仅在机器人使用方面独领风骚,在机器人生产方面同样遥遥领先——日本和韩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生产国,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52%和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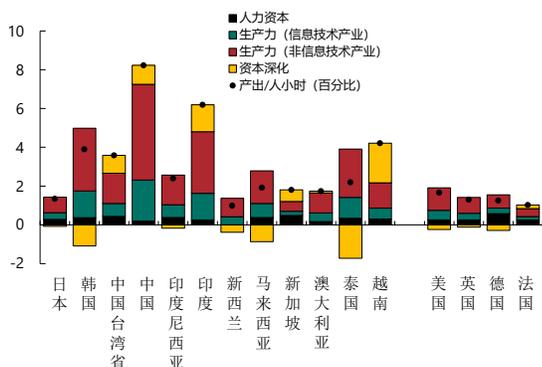
在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亚洲同样居于领军地位。例如,大约十年前,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40%以上,而且中国的电子商务渗透率(占零售总额的比例)目前已经达到15%,而美国仅为10%。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子商务渗透率虽然相对较低,但增长迅猛——例如,电商公司Lazada可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在线购物者提供数百万种商品。在金融科技方面,亚洲经济体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实现了跃进,直接应用新型技术。例如,2016年中国个人购物消费移动支付总额高达7900亿美元,是美国个人购物消费移动支付规模的11倍。最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亚洲一直是加密资产领域的领跑者,包括在首次公开募币(ICO)方面。在中国收紧监管之前,超过90%的比特币交易量都是对人民币的交易,而且还有私人投资者与该区域某些小国进行接洽,建议它们采用加密资产作为法定货币,这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和监管关切。

### 亚洲的经济增长: 从汗水到数字灵感

所有这些技术进步可能最终都会显著促进生产力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尽管就像过去历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况那样——(技术革命的)成效往往会滞后一些。但事实是,亚洲已经从数字化中获益匪浅。正如IMF(2018d)所示,全球创新扩散是过去二十年来驱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中仅数字化创新推动实现的人均增长就占28%左右(图21)。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中,数字化经济所占比重——其中最狭义的代替指标就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所占份额——相对较大。就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份额而言，全世界该比重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中有七个是亚洲经济体。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增长速度也一直远超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印度和泰国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增长速度是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日本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增长速度几乎是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数字化还可以促进非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例如，IMF(2018d)发现，在中国经济中，总体数字化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0.3%。在亚洲，创新呈现向数字化部门倾斜之势，这进一步凸显出数字化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潜力。

图21. 经济增长源  
(百分点：1995 - 2016年)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

## 自动化与未来就业

如上所述，数字化既能拉动增长，也会造成损害，其中一个主要关切点是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IMF(2018d)使用Acemoglu和Restrepo(2017年)开创的方法，以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量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了机器人的使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与一些观察者最担心的情况恰恰相反，该背景文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机器人会损害就业——即工业机器人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从而创造就业）效应抵消了其给劳动力市场造成的错位效应（即，对旧的工作岗位的摧毁）。然而，若单将目光聚焦亚洲则会发现，机器人对整体制造业就业存在轻微的不利影响，且在电子和汽车等某些高度自动化的行业表现尤为明显（图22，小图1至3）。此外，与其他研究一样，

IMF(2018d)还发现，受中等教育的工人比受低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工人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错位影响（图22，小图4）。然而有趣的是，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日本，制造业中机器人密度的增加不仅伴随着生产率的提升，而且还伴随着当地就业和工资的增长IMF(2018d)。日本经验表明，中国、韩国和泰国等未来将面临类似人口趋势的其他亚洲经济体也可能会从自动化中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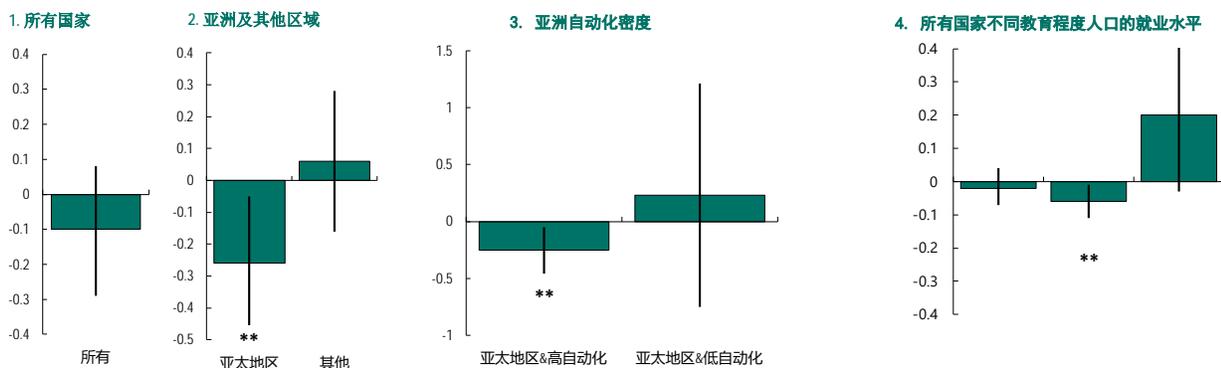
## 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

另一个快速增长的重要的数字化领域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具有为增长和经济再平衡提供支撑的潜力。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子商务意味着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好地获得品类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最终促进消费。麦肯锡(Dobbs等人, 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中国60%的互联网支出来自从传统零售转向线上消费，但其中近40%为增量(新)消费，换句话说，电子商务能够极大地增加总消费额。对于公司而言，电子商务还可以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开启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从而可以促进投资。IMF(2018d)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亚洲企业层面超过30%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以及50%的出口增幅均得益于在线商务的参与（图23）。有趣的是，电子商务似乎对亚洲的小企业尤为有利。

## 金融的数字化

**图22. 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率的估计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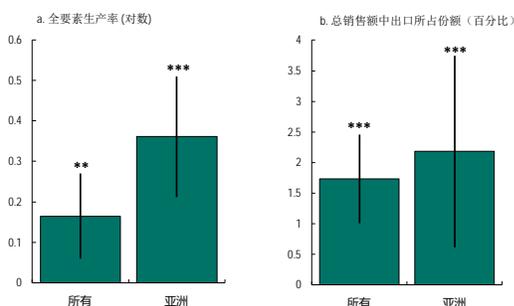
(2010-2014年每1000名工人所对应机器人数量增加一台带来的百分点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机器人工程学会；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本图系根据2010-2014年期间制造业就业变化对每1000名雇员所对应机器人数量变化的回归模型绘制而成。分图1至3是基于40个国家14个制造业分部门绘制而成，分图4是基于按受教育程度细分的就业数据切实可行的国家绘制而成。中等教育是指工人受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非高等教育。条形图表示根据水平轴中每个指定组的估计系数计算得出的估计总效应。误差线表示95%置信区间，\*\*表示p<0.05。

谈到金融部门，金融科技可以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包容性和效率，为实现潜在增长和减贫提供支持。金融科技可以利用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帮助数百万个人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亚洲贫穷经济体内的个人和中小型企业——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迅速获得金融服务，方式包括设计基于金融技术的小额贷款和开发方便使用的簿记和会计工具。金融科技还可以带动金融部门提供更高效率的跨境支付和汇款服务，从而大幅提高效率，进而降低对手方风险并减轻市场参与者的成本负担。

**图23. 电子商务参与对生产率 and 出口的估计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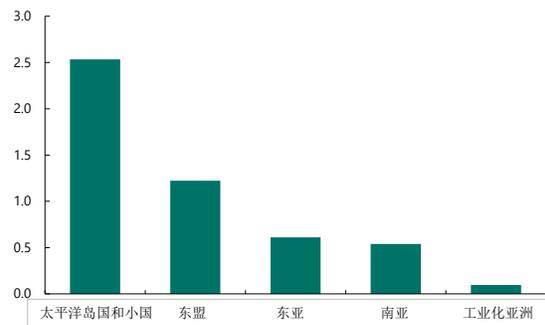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这些数字说明了从两项企业层面估计得出的系数和置信区间：(a) 在控制了企业年龄、规模、外资所有权和出口状况之后，电子商务参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 (b) 在对企业规模、年龄和外资所有权进行控制后，电子商务参与对总销售额中出口所占份额的影响。误差线表示估计系数的95%置信区间。对于亚洲而言，估计系数显示出，超过30%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以及总销售额中出口所占份额的2个单位的增幅，也即50%的出口增幅，均得益于在线商务的参与。\*p<0.05；\*\*p<0.01；\*\*\*p<0.001。

金融科技固然可以为金融部门创造效率和包容性惠益，但如果其应用方式损及竞争、货币政策传导、金融稳定和诚信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同样也会给金融部门带来风险。这些技术可能会破坏现有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并导致相关活动向受监管部门之外转移。IMF(2018d)发现，在技术跨越式发展倾向更为突出的经济体，

其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银行分支往往呈日渐下行之势。与身处迥异监管环境的美国科技公司不同，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GO-JEK公司等亚洲科技巨头现已成为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商，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另外，加密资产可能会带来与洗钱、逃税、规避资本管制和其他形式非法活动相关的风险。随着金融系统走向数字化，网络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图24. 减少与数字化前沿之间的距离的一半后可获得的潜在进口增值税收入，2016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基金组织《财政监测报告》；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 通过数字化巩固公共财政

最后，数字化（与良好的制度和绩效相关联）为改善亚洲公共财政带来了机遇。虽然存在侵蚀税基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加强数据共享的政策和预扣机制加以化解。实际上，通过改进交易报告，政府通过数字化还可以增加增值税、关税及其他收入。此外，亚洲经济体如能将其与全球数字化前沿国家之间的差距缩短一半，则带来的进口增值税收入增量可达到

国内生产总值的0.6%，对于通常距离全球前沿更远的亚洲小国而言，估计收入增量更是约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IMF 2018d）（图24）。数字化还可以促进公共财政管理和提高公共支出使用效率（增加社会援助计划的精准性），从而增强财政政策的包容性、公平性，最终增强其可持续性。

## 数字时代的政策

数字革命固然不可避免，但其结果是福是祸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要发挥数字革命的潜力，必须采取全方位的政策并运用新思维。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跨越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接受数字革命不可避免这一现实。政策应对措施务必要在推动数字创新与化解数字化相关风险之间保持适当平衡。利用数字红利的政策包括：革新教育，以满足对更灵活的技能组合和终身学习的需求，开展新的培训，特别是面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工人的新技能培训；降低工人与工作之间的技能不匹配程度；投资于可促进竞争和创新的实体基础设施和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挑战，包括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系统建设。

亚洲（和世界）各经济体的初始条件存在差异，因此，政策优先事项各不相同。但考虑到这些技术固有的全球影响力，区域和国际合作将是制定有效政策应对措施的关键，而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减轻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政策还可起到改善福利之效。一个社会支持必要的转型、为落后群体提供支助的意愿越高，那么该社会适应创新步伐的速度就会越快，此时，新技术的成果能提高福利水平，让社会全体成员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只要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数字革命就可以成为推动该亚洲和世界增长和繁荣的新引擎。

## 6. 让亚洲继续屹立前沿

亚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但亚洲在中长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贸易依赖型增长战略将不再可行（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下）；人口老龄化会在多个方面拖累经济表现；生产率加速增长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出现；亚洲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的数字化纵然会促进生产力，但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严重破坏。

这些力量对亚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完全取决于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很可能会持续存在，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机会可能会减少。但亚洲可以通过放宽其限制性相对较高的贸易和投资体制（特别是在服务业部门）来促进区域内贸易，从而抵消这一冲击，创造新的地区增长来源。生产率增长可能会迟缓，但完善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帮助企业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将有助于解决导致经济放缓的一些关键性微观因素。就数字经济而言，如上所述，政策制定者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大力发展教育、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使各自经济体能充分享用数字化所带来的惠益，并确保数字化成为关键性的经济增长引擎，同时采取措施减缓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领域的调整。在应对这些具体挑战的同时，亚洲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尽其所能，确保持续开展地区和全球政策合作，包括与全球机构接触交流和参与其治理。

总而言之，亚洲的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着严峻挑战，但只要维持稳健的决策，该地区很有希望在未来十年乃至更远的将来保持其前沿地位。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17.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28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17.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7*. Manila.
- Cerdeiro, D., and R. Nam. 2018.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rade Policy Indicators." IMF Working Paper 18/3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Decker, R. A., J. Haltiwanger, R. S. Jarmin, and J. Miranda. 2016.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Hutchins Center o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at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No. 23,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 Dobbs, R., Y. Chen, G. Orr, J. Manyika, M. Chui, E. Chang. 2013. "China's E-Tail Revolution: Online Shopping as a Catalyst for Growth."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s. 2017. *World Robotics 2017*. Frankfurt.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6. "Global Trade: What's Behind the Slowdow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October.
- . 2018a. "Asia as the Cycle Matures."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Background Paper No. 1. Washington, DC, October.
- . 2018b. "The Evolving Role of Trade in Asia: Opening a New Chapter."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Background Paper No. 2. Washington, DC, October.
- . 2018c.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 Boosting Firm Dynamism and Weeding out the Zombies."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Background Paper No. 3. Washington, DC, October.
- . 2018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Asia: Disruptor or New Growth Engine (or Both)?"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Background Paper No. 4. Washington, DC, October.
- . 2018e. "Manufacturing Job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and Inequality."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2, Washington, DC, April.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Making Trad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All: The Case for Trade and for Policies to Facilitate Adjustment*.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8. *Reinvigorating Trade and Inclusive Growt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McGowan, A. Muge Adalet, D. Berlingieri, and V. Millot. 2017. "The Walking Dead?: Zombie Firms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1372, OECD Publishing, Paris.
- Mano, R. 2016. "Quantifying the Spillovers from China Rebalancing Using a Multi-Sector Ricardian Trade Model." IMF Working Paper 16/2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Mathai, K., G. Gottlieb, G. Hong, S. E. Jung, J. Schmittmann, and J. Yu. 2016. "China's Changing Trad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LMV Economies." APD Departmental Paper No.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